

# 中國校園兇殺案背後的 政治社會問題

何國朝

2010年3月23日至5月12日，短短五十天之內在中國發生了六起幼兒園或學校兇殺事件。22個小孩被殺死，16個受重傷。對於校園兇殺事件，任何一個正直、平常的人都會譴責這種不人道的行為。但是，在目前連研究自殺也受到控制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得到關於兇手的全面信息。關於兇手的責任問題，還需進一步的研究。可是，把原因全推給個人，是對死去的幼童的不公正。面對他們的無辜和不幸，我們必須探究這些事件背後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

這些校園兇殺案有下列的共性：第一，兇手先濫殺毫無反抗之力的弱小幼童，然後自殺；第二，兇手都是男性，平均年齡為42.5歲，正處於中年人危機開始的時候。與此相比，美國校園兇手的平均年齡是14至20歲；第三，這些兇手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被排斥在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第四，這些事件發生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即便是陝西漢中也是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地區。

中國歷史上曾發生在戰爭時殺嬰兒取食的事件，近代農村也有溺死女嬰的事件。但是當今中國這一系列的妄殺幼童之事，真是奇特驚人的。魯迅曾指出過中國文化中「吃人」的本性。當代中國道德文化的倒退，不但沒有減少這些「吃人」的本性，反而變本加厲地加劇了這些「吃人」毒性，把中國文化中的黑暗面推到了極點。

美國校園兇殺者往往是青少年。他們吸毒，有精神問題，其自殺和兇殺都是一種反社會的仇恨人類的精神變態。相比較，中國這些兇手很難說是吸毒引起的精神變態，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他們是精神病患者。

從表面上看，校園兇殺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但背後卻是一種殘酷的理性算計——「我要以這種方式對社會不公正提出抗議。」鄭民生選擇的對象是福建南平貴族學校的幼



兒，陳康炳選擇廣東湛江最好的第一小學，徐玉元選擇江蘇泰興中心幼兒園，他們要殺死「貴族」的下一代來發洩自己對社會的怨恨。鄭民生在被抓之前，大聲喊道：「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

2008年，楊佳在上海殺死了六名警察，在地下文化中被譽為英雄、大俠，卻未能造成社會轟動。但是通過殺小孩，校園兇殺案的兇手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會震動。只有通過這種最極端、最野蠻、最不人性的方法才能使中國權力高層震動，才能使社會最底層的聲音被聽到。為甚麼正常的渠道被堵塞了？校園兇殺背後是一種殘酷的、奇特的社會行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以殺死比他們更弱勢的幼兒的方式來對社會報復，對社會不公正表示抗議，來獲得社會對他們的奇特的「尊重」：即造成社會震動，中央震驚。

這種行為方式背後的社會心態與恐怖主義者的社會心理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恐怖主義者以傷害無辜民眾並自殺的行為反美，反對一個虛幻的物質世界，捍衛其心目中的宗教信仰；相反，中國的兇手並不反對物質世界，而是怨恨他們在物質世界中的匱乏。他們旨在反對當今物質世界中分配的不公正！

但是，對不公正的社會的抗議，為甚麼要牽連幼稚無辜的兒童呢？為甚麼要以這種方式把事情鬧大？細究之，我們就可以看到社會溝通渠道的封閉，高度政治控制的運用已使一些人無路可走。

普通下層百姓碰到不公正的事，怎麼辦？中國正常的社會溝通渠道如下：

第一，參加民主協商會議申訴自己的怨氣。但是中國基層民主協商會議往往排斥最邊緣、最底層的人物，參加會議者往往是社會精英。浙江澤國鎮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可以使一部分的邊緣人物（約百分之十的文盲）參與政治活動，但這種方法並沒有廣泛運用。地方領導往往指定一些社會精英來參政。社會協商政治不夠廣泛，顯然無法包括和吸納最底層、最邊緣的人群來參與。

第二，上訪制度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個申訴機會和渠道。但是近幾年政府為了維持穩定，不少上訪者被控、被打。筆者在2008年碰到一個上訪婦女，要求得到合理的土地賠償，她丈夫因上訪被打成了殘廢。她繼續到處上訪，常去北京，但毫無結果，更多次被抓起來。無奈之中，她找到一個外國人並向他申述其冤。當她帶了外國人去看被強行徵用的土地時，連這個外國人也被當地警察扣押起來。如果她是一個絕望的男人，筆者可以想像，她很有可能走上兇殺之路。

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公民不可能自發組織起來上街遊行，抗議不公。當正常的社會溝通道路走不通時，當一個最底層的人四處無路可走，天地不應，就會有人在絕望中走上兇殺和自殺之路。

2010年校園兇殺事件頻發，說明近幾年的高控政治方法已用到了極限。群眾抗議和政府控制產生了一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不准上街遊行，人們就發明了群體性「散步」；不准罷工，出租車司機就發明了「同時休息」；輿論控制，人們就到網上「閒聊」。前幾年盛行的「突發性群體事件」也是群眾抗議的一種形式。當政府採取各種手段，不准「散步」，不准「休息」，甚至控制「閒聊」中的「關鍵詞」時，當各種渠道都堵塞時，最極端的人又採取了這種「自殺」或「兇殺」行為方式。

面對這些兇殺和自殺事件，中央主管安全的領導親自出面，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加強安全措施，增加安全工作人員。近幾年為了解決社會穩定問題，從上到下建立了一支宏大的維穩隊伍。但是，維穩隊伍愈大，社會問題卻愈多。愈維穩，愈不穩；愈不穩，愈要加強維穩隊伍。這是近幾年政治控制中的一個怪圈。

中國當今的監控政治中，出現了嚴重陰陽失調的狀況。古代，皇帝不惜重金設言官、諫官，在情治控制系統和公共輿論系統中保持一種信息的平衡。今天，政府控制力大大高於社會協商力，維穩隊伍的人數大大多於基層推進民主政治的人數。有人甚至把那些在基層推進民主政治的人也看成是不穩定份子。當基層協商民主停頓了，一個為社會最底層、最邊緣人物提供說話的場所就不存在了。當基層不推進協商民主時，社會不穩定的現象就更多了。協商民主有助於化解各種社會衝突，有利於社會穩定。但是目前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政治文化：不推進協商民主是正常的，而推進協商民主卻是一個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是一種「非正常」的政治行為。這種奇特的政治文化正好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兇殺這種奇特的社會行為邏輯相對應。

「穩定就是一切」，這種奇特邏輯恰恰產生了「一切都是不穩定」。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不穩定的行為。為了穩定，不惜以金錢來買穩定。對此老百姓的對策就是不斷鬧事，積小鬧為大鬧，甚至採取兇殺方式來追求自己或其家庭的利益最大化。中國現在的穩定文化產生了奇特的鬧事文化：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鬧事走極端，轟動上高層。

此外，中國鬧事文化還與中國奇特的抱怨政治有關係。「民憤」都引向抗議國家，人民老是抱怨北京政府。當中央用高控方法統管重大問題時，一旦有問題，民眾就到北京上訪；一旦解決不了問題，就抱怨北京。聯邦制的最大好處就在於抱怨政治不全指向中央，而單一制政治的弊病就在於抱怨政治都指向中央政府。中國精英卻對聯邦制避之如蛇蝎。

中國現有的穩定文化與目前中國繼承政治的缺點也有關係。雖然當代中國成功地、和平地轉移最高權力和實現了任期制，但繼承政治制度的缺點也暴露出來了。為了保證在現任期內不出事，在權力轉移最後幾年就會出現一個高度監控政治的局面，而且這種高控手段往往在短期內有效。通過高控手段，中國平穩地度過了2008年奧運會以及2009年幾個重大歷史事件紀念日。

現在應該是對這種權力繼承政治的弊病進行反思的時候了，也應該探索一種更好的社會控制制度和辦法。如何為社會最弱勢群體提供一套人權制度保障和制度上申述抗爭的渠道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監控只是一個片面的回答，社會協商民主制度可能是另一個更好的回答。只有在控制權和社會協商權保持平衡發展中，中國才有希望化解各種潛在的社會危機。中國今天的高控制制度和辦法恰恰是不穩定之源，中國現存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缺乏民間機制來調解各種社會問題。國家必須真正將權力還於人民，真正實現地方自治，真正實現和推廣社會協商民主制度。